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 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①

夏立平

(内容提要)全球一切事物都是共生在一个大系统中,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全球共生系统理论的相互依存论决定了优化全球体系的必要性。全球体系内中美相互依存上升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建立新式战略稳定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条件。中美战略文化的博弈和磨合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路径。

关键词:美国外交与军事 中美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 战略文化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是将共生系统理论放在全球角度来研究和构建的。共生系统理论是在将共生理论和系统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理论。^② 本文将从全球共生系统理论角度研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一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的相互依存论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的主要论点包括:全球一切事物都是共生在一个大系统中,是

① 本文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建构与方略选择”(项目批准号:14AZD060)的中期成果之一,也得到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美国在亚太地区海权联盟体系研究”(项目编号:CAMAZD201608)和同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专项“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智库建设”资助。

② 夏立平《论共生系统理论视阈下的“一带一路”建设》,载《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2期,第31页。

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这种共生状态不仅存在于生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而且存在于人与社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

(一) 全球体系已经成为世界上三种共存的体系之一

现在世界上实际上有三种体系共存,即国际体系、世界体系和全球体系,这三种体系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在这些体系内,行为体之间是共生的。

1. 国际体系的主体是国家行为体

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国际体系指诸多功能相同或相似的单位(民族国家)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而组合起的一个整体,作为自助单位的民族国家的互动构成了国际秩序。^①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认为,国际体系模式是国际政治的“宏观模式”。他运用大系统的基本原理提出国际体系的六个模式,包括均势体系、松散的两极体系、紧张的两极体系、等级体系、单元否决系统等。^②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在他们的代表作《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③“相互依赖影响着世界政治和国家行为;而政府行为也影响着相互依赖模式。政府通过创制或接受某些活动的程序、原则或制度(institutions)来调节和控制跨国关系、国家间关系。我们称这些安排为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④

国际体系是国家之间的体系,国家之间是相互联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发展。

2. 世界体系的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还包括世界中的各种力量板块

这些力量板块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西方国家、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G20国家、“金砖国家”等。力量板块是由国家为主体构成的,但它们不是只代表某个国家的利益,也往往不是一个国家能控制的。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提出了世界秩序的三个不可分割的定义要素。他认为,最理想的是均势所造成的稳定体系——温和型体系的最高体现,而最重要的途径是发展国际组织。他还认为,世界秩序是“世界政治深刻的、渐进的,但是有限度的变革过程。”^⑤

3. 全球体系的主体包括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

①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② Morton O.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Publishers, 1957), pp.21~86.

③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④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第6页。

⑤ Stanley Hoffmann, *Primacy or World Ord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New York: McGraw-Hall Book Company, 1980), p.189.

全球体系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行为体多元化。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迅速发展,虽然主权国家仍是国际关系中基本行为主体,但国际关系中新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等大量增加,欧洲联盟则是超国家行为体,这些导致国际行为体多元化。

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迅速发展,各种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大大增加,合作紧密度不断加强。许多政府间国际组织已具有独立的国际法人资格,已发展为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基本行为主体。绝大多数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各种区域合作组织,成为促进国际和区域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合作的积极因素。

但现在世界上还存在少数军事联盟,这些军事联盟是冷战的遗留物,它们中的某些对区域和平发展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二) 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 是全球共生系统的高级状态

共生状态(the symbiotic state)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共生状态的初级阶段是相互联系(interrelation)。这种相互联系有比较松散的、间接的,也有比较紧密的、直接的。“蝴蝶效应”^①就反映了这种相互联系。

共生状态的中级阶段是相互共存(mutual coexistence)。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在探讨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时指出“由于这种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②这种共同存在就是相互共存。中国等国家倡议并且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实行相互共存。

共生状态的高级阶段是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相互依存可分为三种状态,即水平相互依存、垂直相互依存、共生相互依存。以经济组织为例,当几个组织之间竞争以争夺资源或提供相同的服务时,就形成了水平相互依存;当几个组织处于一个完整生产链中的各不同阶位时,就形成了垂直相互依存;当两个组织在功能上相互补充,为第三方提供服务时,他们之间是互惠互利的,就产生共生相互依存关系。关于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指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存,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

① 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 即拓扑学连锁反应,是指在一个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这是一种混沌现象。任何事物发展均存在定数与变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其发展轨迹有规律可循,同时也存在不可测的变数,一个微小的变化能影响事物的发展,说明事物的发展具有复杂性。

②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6页。

影响为特征的情形。”^①当前全球体系中的相互依存性在上升。

(三)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的相互依存论决定了优化全球体系的必要性

全球共生体系应该具有普遍性、交互性和内生性。

全球共生体系的普遍性指该体系是多层次、全方位、全领域的共生。这包括社会内部共生性、国家之间共生性、人与自然共生性。社会内部共生性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内部是共生关系。国家之间共生性表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共生关系。人与自然共生性表明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与自然界是共生关系。

全球共生体系的交互性指“人类社会并非各种要素的机械集合,而是诸要素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联系和作用关系的有机整体”;^②人类与自然界也是相互之间存在互动联系和作用关系的有机整体。

全球共生体系的内生性指该体系中的各种共生关系,包括安全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等都是各种行为主体在具体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或超国家行为体、各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交往过程中产生,并随着交往手段、方式和进程而改变。全球共生体系的内生性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该体系的内生性,全球共生体系具有共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全球共生发展应该包括改善共生关系、改革共生秩序和优化共生结构。

改善全球体系的共生关系。由于资源相对于人类需求总是具有稀缺性,围绕资源展开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人类一直面临的重大问题。解决办法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改善各种共生关系中不平等、非正义的因素,寻求合理地交换、分享和竞争各种资源,例如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改革全球体系的共生秩序。现存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基本上是合理的,但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合理因素。同时,世界上出现许多新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污染、地球变暖、毒品走私、高致命传染性等疾病等,对人类生存的挑战上升。因此有必要对现存的国际秩序进行改革和完善。

优化全球体系的共生结构。在全球体系中,共生关系和共生秩序的关联状态和作用形式决定了共生结构的优劣程度。当前全球体系中相互依存在上升。优化全球体系的共生结构就是通过改进全球各层次和各领域资源交换、分享和流动方式以及

^①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② 胡守钧、王世进、李友钟《共生哲学论纲》,载任晓《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结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从而有助于共生关系和共生秩序的生成、改革和完善。长远目标是建立共生性全球体系,即建立以相互依存为基础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共生体系。

二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的辩证论

“共生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①“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②全球一切事物都是共生在一个大系统中,适用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

(一) 三种共生

全球体系中既有互利共生,也有偏利共生,还有偏害共生。互利共生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体都因对方的存在(合作或竞争)而相互有利。这只是对共生的狭义理解。从广义上说,偏利共生和偏害共生也都是共生。偏利共生是指一方受益,而对另一方无害。偏害共生是指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害。

总的来讲,全球体系中互利共生的因素在上升,而偏害共生的因素在下降。

(二) 两种相互依存

全球体系中既有正面相互依存,也有负面相互依存。正面相互依存是指相互依存的矛盾双方都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中获益,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受损,可能给另一方带来损失。例如,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有很大发展,这对两国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已成为中美关系稳定的“压舱石”。尽管两国在经贸关系中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但双方谁也离不开谁,都在努力寻求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和矛盾。中国不希望美国经济陷入危机不能自拔,美国也不愿中国经济停滞不前。如果中美断绝经济往来,双方都会遭受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尽管相比较而言,美国的损失会比中国稍小一些。

但这种正面相互依存既可能是对称性的,也可能是非对称性的。例如,至2016

① 苏长和《以新普遍主义构建世界秩序:对共生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载《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1期,第20页。

② 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

年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①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是非对称性的。这种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关系具有敏感性。美国经济开放程度高,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也很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之一的中美两国,一方经济形势或经济政策的小变化,都会导致另一方经济迅速发生有代价的变化。这种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关系是脆弱性与韧性并存。

负面相互依存是指一旦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破裂,相互依存的矛盾双方都会遭受重大损失。例如,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形成了战略核武器的“恐怖平衡”。一旦两国发生核战争,双方都面临毁灭的危险。因此,双方都尽力避免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

(三) 共生责任观与面对的风险

在全球体系中,人类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为了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人类社会必须树立共生责任观,通过合作来消除风险。当前全球体系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安全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技术风险等。风险与责任之间是一对矛盾。

例如,当前人类面临全球变暖、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海盗、贫困、艾滋病等跨国安全风险的挑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合作才能应对这些挑战。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在全球体系中的共生责任,树立共生责任观,通过责任共担、风险共御,来妥处这些全球性安全风险。

三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的认识论

(一) 人类对全球共生体系的认识是逐步提升的

虽然共生系统是客观存在,但人类对共生系统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早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年,中国人就开始逐渐形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将世界理解为阴阳两性,但是这阴阳二性并非处在对抗的两极,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阴一阳之谓道”,即阴阳两性谁都不能缺少,缺一就不成其为“道”。“生生之谓易”,不管是天道还是人道,都需要阴阳而互动。因之,中国哲学的精神强调自强不息,天地人和谐相处,周延流转。在这里,人不是独立的个体,人际关系亦非对抗性关系,因而也就不应以斗争求发展。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思

^① 2017年1月2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744127亿元(相当于10.8万亿美元,系笔者根据2017年2月1日人民币美元汇率计算),国家统计局《2016年全年我国GDP初步核算结果》,参见网页:<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2016年中国GDP>;美国2016年GDP为18.037万亿美元,“United States GDP 1960-2017,”available at: <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gdp>。

想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与“和为贵”的思想。《礼记·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认为只有达到天地万物和谐,才能正天地,育万物。在我国古老的中医学说中,也早就提出了“五行学说”、“相生相克”的“共生理论”。

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 1879年提出“共生”概念,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其要素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①

20世纪中叶以来,共生理论和方法不仅逐渐应用到医学领域和农业领域,而且开始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如经济学等。一些西方社会学者认为,在科学和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在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的同时,具有高度知识的人与生产工具的结合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密切。因此,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以此为基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家提出应该用一种“共生方法”的理论来设计社会生产体系,强调重视社会生产体系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1998年,中国学者袁纯清运用共生理论研究小型经济,认为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共生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可塑状态;共生不仅一种生物识别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②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学者开始将共生理论应用在国际关系领域。金应忠研究员的论文《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共生’不仅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③苏长和教授在论文《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建立共生型国际体系的思路。^④胡守钧教授论文《国际共生论》强调,必须从社会共生关系出发观察社会(包括国内社会、国际社会)。^⑤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1945年签署和批准的《联合国宪章》宣示“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⑥这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后,国

① “De Bary, (Heinrich) Anton, and Charles C. Gillispie,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0), pp.611~612.

② 袁纯清、谢锐《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③ 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23页。

④ 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35页。

⑤ 胡守钧《国际共生论》,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10页。

⑥ 《联合国宪章》,参见网页:<http://www.un.org/zh/sections/un-charter/preamble/index.html>。

际社会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刻认识。

1954年6月,中国、印度等国提出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

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拥有的核武器所具有的毁灭人类的威力,促使世界上的有识之士反思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威胁,首次使国际社会从对负面因素的认识中产生了人类共同体意识。

2015年12月12日,出席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全球气候变化新协定(即《巴黎协定》)。协定共29条,包括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该协定将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这表明工业文明带来的对地球环境的破坏,已经促使人类意识到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而维持共生的价值。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共生体系高级阶段的目标

实现共生型全球体系的道路,将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全球体系,“权力均势”理论在这一阶段的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我们现在仍处于这一阶段。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开始逐渐超越这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相互依存状态下的全球体系,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阶段将更多地建立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世界开始逐渐进入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世界总体上将由不对称相互依存向对称性相互依存转变。即上升中大国的实力逐渐接近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大国的实力,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完成国家现代化的过程,而且要逐渐缩小和消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

第三阶段是一体化条件下的全球体系,世界将逐渐实现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之一,是逐渐实现从区域一体化到全球一体化。只有实现全球一体化,才可能实现国家之间利益基本和谐,从而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打下坚实基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邓小平理论最早阐述了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尊重对方国家的利益。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

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①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②这表明中国寻求中国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结合。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③2012年12月,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时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明确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提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④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实际上就是共生型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他指出“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而合作共赢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⑤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⑥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建立伙伴关系的前提是坚持不结盟原则,即结伴而不结盟;其二,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遍布全球。现在中国已经与67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等建立了72对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具有多层次、多样性的特点。例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等是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基础。“一带一路”建设将加强这些伙伴关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将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从长远来说,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将成为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基础。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30页。

②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③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参见人民网网页:<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8/c1001-19612670.html>。

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

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⑥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2015年3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旨演讲中提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①习近平指出了迈向命运共同体努力的“四个必须”: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②

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

但当今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使世界各国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而将责任共担、利益同享、相互包容等理念转化为各国的自觉行动。

四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视阈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打破“崛起国与霸权国必然冲突”历史魔咒,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合作的新型关系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共生型全球体系的必由之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美中两国(21世纪的主要竞争者)首脑承诺通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避免欧洲悲剧的重演……这是避免重蹈历史悲剧覆辙的唯一出路”。^③

大国关系通常决定国际关系的性质。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期间,提出要构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是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④这是中共第一次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方针载入党的重要文献,对于指导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具有重大意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运用全球共生系统理论研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可以发现中国和美国同在全球共生系统中,两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相互依存性在上升,中美社会之间的相互交往在发展,这些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有利因素。但另一方面,两国的经济

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旨演讲《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载《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旨演讲《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

③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481页。

④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2012年11月18日,参见网页:<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8/c1001-19612670.html>。

和安全利益仍存在重大差异,战略文化不同,这些使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重大挑战。

(一)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应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依据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的确立有助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迅速崛起震惊了古希腊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战争。长达 27 年的战争虽以斯巴达获胜而结束,但斯巴达也遭受重大损失,其霸权也只持续了数十年。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认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①这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

现在中国和一批发展中大国正在兴起,成为 21 世纪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突出特点之一。它们与美国等守成大国之间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正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命题所要解决的问题。

当前在国际关系史上出现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能够摆脱“崛起国与霸权国必然冲突”历史魔咒的现实条件。

首先,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一时代与过去的战争与革命时代等其他时代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它们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获得独立后,绝大多数国家致力于国内经济发展和进步。人民要和平,国家谋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第二,大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与过去相比的最重要的区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世界正在开始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促使大国必须摈弃对抗和遏制等冷战思维,妥善处理分歧和矛盾,加强合作和国际制度建设,共同应对挑战,实现合作共赢。这一新阶段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世界总体上将由不对称相互依存向对称性相互依存转变。即上升中大国的实力逐渐接近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大国的实力,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完成国家现代化的过程,而且要逐渐缩小和消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

第三,大国共同面临着各种非传统安全的严峻挑战。安全范围由传统安全扩大到非传统安全,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单独解决全球变暖、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跨国犯罪、海盗、环境污染、艾滋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大国只有合作才能够共同应对这些非传统安全挑战。

第四,核武器和网络战能力的发展等成为制约大国战争的有力因素。大国之间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版,第20页。

在核武器方面形成相互威慑,促使它们尽力避免相互之间爆发武装冲突或战争。尽管中国核武库很小,但已具有一定的核报复能力。由于核武器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因此既是世界面临的重大危险之一,也是避免大国战争的最有力的制约因素之一。一个国家和社会越依赖网络,在电脑病毒和黑客攻击的威胁下越脆弱。现在一些国家已具有网络战能力,这实际上也在大国之间形成相互威慑,而且它们必须合作治理网络空间,有效应对网络黑客甚至网络恐怖主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将全球共生系统理论作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依据。共生系统理论是通过把共生理论和系统理论相结合,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创新。共生系统理论的核心是合作共赢。将该理论运用于国际体系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可以得出以下论点:

其一,全球体系是一个大系统,世界一切事物都是共生在这个大系统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它的各组成部分之间都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中,都是共生的。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者之间、非国家行为者之间、国家行为者与非国家行为者之间都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

其二,全球体系这一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没有部分便没有整体,因而整体依赖于部分;另一方面,部分又是整体的组成部分,部分依赖于整体。但整体并不等于各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新质特征的整体。当今全球体系虽然仍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但随着一批新兴大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以及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亚洲的崛起,全球体系中的新质正在增加,霸权主义受到更多的抵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多的被接受和尊重,新安全观已经提出。

其三,全球体系这一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即对立统一的。他们既共生又竞争、既对话又斗争、既包容又排斥。正是这种事物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例如,中国和美国的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它们存在深刻的矛盾:美国是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上升的大国;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即后现代化国家,而中国是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但同时,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或并行不悖的利益也很大。中美之间既共生又竞争、既对话又斗争、既包容又排斥的对立统一,成为推动相互关系和国际体系运动、变化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四,由于系统中的各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是共生的,一个国家必须在考虑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考虑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近年来,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认识到,在“地球村”这一共生系统中,世界各国必须合作才能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威胁;而只有实行开放包容的对外战略,才能实现合作共赢。从长远来看,世界应该逐

渐建设共生型全球体系。

(二) 全球体系内中美相互依存上升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在冷战时期,自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美关系大门打开后一段时间内,两国关系基础中只有一根支柱,即共同的敌人——苏联。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基础中旧有的支柱不复存在。现在中美关系基础中出现两根新的支柱,即经济与安全。在经济与安全领域,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都在上升。

1. 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

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与日俱增。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中美贸易额达5583.9亿美元,同比增长0.6%。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①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5980.7亿美元,增长1.3%。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161.9亿美元,下降6.1%,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7%,提升0.1个百分点;自中国进口4818.8亿美元,增长3.2%,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5%,提升1.6个百分点。^②2015年,中国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③

而且,中美互为主要外国投资来源地之一,中美双向投资保持增长。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5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6万个,实际投入774.7亿美元。^④美国是中国第六大外资来源地。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保持良好增势。2016年,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456亿美元。^⑤美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四大目的地。双方相互投资涉及工业、农业、科技、金融和工程承包等广泛领域,在新能源、节能环保、医药、智能电网、航空等领域的合作也在稳步推进。此外,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截至2016年10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为1.1157万亿美元。

① 中国商务部《2015年中美贸易简讯》,参见网页: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new/view110209.asp?news_id=48112。

② News of U.S. Census Bureau,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Washington, D.C. 20230, Decemb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bea.gov/newsreleases/international/trade/2016/trad1215.htm>。

③ News of U.S. Census Bureau,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④ 中国商务部《2015年中美贸易简讯》,参见网页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new/view110209.asp?news_id=48112。

⑤ Thilo Hanemann and Daniel H. Rosen,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cent Trends and the Policy Agenda" ,Report of Rhodium Group, December 9, 2016, available at: <http://rhg.com/reports/chinese-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recent-trends-and-the-policy-agenda>。

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是双赢的,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胀”,面对经济增长接近停滞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困境。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划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和两大市场。到此时,西方市场已经接近饱和,而亚洲“四小虎”等又没有向美国提供大量价廉物美产品的能力。正是由于冷战结束导致的经济全球化和新兴市场的发展,使美国产品的出口市场扩大了数十倍。以改革开放的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国家向美国出口的大量价廉物美产品也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显著降低。1978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 2164.6 亿美元,2016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0.8 万亿美元,增长了 49.8 倍。^① 1978 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 22947 亿美元,2016 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8.037 万亿美元,^②增长了 7.86 倍。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实际增长了 15.7 万亿美元。

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也给世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1978 年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 10 万亿美元,2015 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77.3 万亿美元。^③ 美国是世界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具有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之一。中美在经贸领域是互补的。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升。

2. 中美在安全领域的相互依存

中美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安全、稳定、发展负有重大责任。两国都面临许多安全挑战,在许多安全事务中存在共同利益或并行不悖的利益。中美面临的安全挑战和有共同利益的安全事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全球层次。中美都面临全球变暖、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海盗、贫困、艾滋病等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合作才能应对这些挑战。

其二,区域层次。中美在解决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地区问题,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上有共同利益。尽管两国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等方面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只有中美充分协调、密切磋商,才能管控这些问题,并推动各方朝最终解决这些问题方向前行。

其三,双边层次。中美之间也存在一些双边安全问题。有些双边安全问题也是

① 2017 年 1 月 20 日中国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 2016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74.4127 万亿元(相当于 10.8 万亿美元,系笔者根据 2017 年 2 月 1 日人民币美元汇率计算),国家统计局《2016 年全年我国 GDP 初步核算结果》,参见网页: [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2016 年中国 GDP](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2016%20%E4%B7%B1%20%E5%9C%B0%20%E5%9C%B0%20%E5%9C%B0)。

② “United States GDP 1960~2017,” available at: <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gdp>.

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2016 年 4 月 12 日,第 16 页。

全球问题或地区问题的具体化。例如,网络安全问题既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也是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

中美有义务全方位地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社会共同探索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两国加强沟通,相互协调,寻求合作,就能为解决以上三个层次的问题做出贡献,从而为世界安全和发展创造机遇和用好机遇。

3.中美之间的负面相互依存

如果中美出现对抗,将造成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许多国家将面临战略困境:如何处理与经贸关系密切的中国和安全盟友的美国之间的关系。这将对亚太地区和发展的形势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中美都是核武器国家。尽管中国的核武库与美国相比很小,但中国也具有一定的核报复能力。中美如果因台湾问题而发生武装冲突,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核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不仅两国而且世界都会遭受严重损害。中国坚定维护海上主权和领土。如果美国的某些盟国依仗美国势力,在与中国的海上领土主权争端中采取强硬和挑衅政策,也有可能导致与中国的武装冲突。如果美国干预这种武装冲突,也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武力较量。

中美如果陷入对抗,也将对两国的经贸关系带来灾难性影响。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债权国。中美关系如走向敌对,将迫使中国抛售美国国债,这将使两国金融和经济都遭受巨大损失。

4.中美只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才能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

当今世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甚至冷战时期的世界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各国之间经济上相互依存已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程度。与此同时,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在上升,全球变暖、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水资源匮乏等问题将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根据共生系统理论,中美两国处于一个共生系统中。^①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妥善应对这些严重挑战。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必须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抛弃冷战思维,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在世界近代史上,从维也纳体系建立之后,欧洲一百年没有发生全面战争,维持了相对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大国协调。现在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也有必要形成大国协调。而形成大国协调,最重要的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① 夏立平《论共生系统理论视阈下的“一带一路”建设》,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38页。

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问美国前夕接受《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应有充分信心、持久恒心,始终抓住共同利益这一主线,不要让这样那样的矛盾、分歧左右中美关系大局,要携手走出一条大国之间和谐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新型道路。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正式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①美国奥巴马政府起初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做出了较为积极的回应。同年3月7日和4月10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和美国海军学院的两次讲话中对建设中美新型关系表示认可。她说“努力避免陷入不健康的竞争、对抗或冲突;避免以牺牲他方利益进而损害相互关系作为成功的代价;并且做到不疏于履行我们对于国际社会的责任。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没有先例的做法”。^②她认为,“一个兴旺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兴旺的美国也对中国有利。……只有当我们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卓有成效的美中关系时,我们才能成功地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③随后,同年6月19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就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四点建议。奥巴马总统表示,愿同中方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将为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有效应对全球挑战提供重要框架。^④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新领导集体执政和奥巴马总统进入第二任期后,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3月14日通电话时表示,美方希望同中方共同努力,保持两国元首交往,加强对话沟通,再接再厉,继续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方向稳定向前发展,努力构建基于健康竞争而非战略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⑤同年11月20日,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Susan Rice)在乔治城大学发表讲话,勾勒了美国对亚太政策的要点。对于中美关系,赖斯表示美国将寻求具体实施新型大国关系(to operationalize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在两国利益存在交

① 常红、康登慧、陈冰洁《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外交战略是这样炼成的》,人民网,2016年2月14日,参见网页:<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214/c1001-28121379.html>。

② Transcript of U.S. State Secretary Hillary R. Clinton's speech to the U.S. Institute of Peace China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March 7, 2012, available at: <http://australianpolitics.com/2012/03/07/hillary-clinton-on-china.html>。

③ Transcript of U.S. State Secretary Hillary R. Clinton's Forrestal Lecture to the Naval Academy, Annapolis, Maryland, April 10, 2012, available at: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texttrans/2012/04/201204113668.html#axzz4Xlw2s3zG>。

④ 《胡锦涛在墨西哥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载《人民日报》,2012年6月20日。

⑤ 《习近平同奥巴马通电话时强调相互尊重扩大合作》,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15日。

集的事务上形成更深度的合作,而且不仅限于亚洲,同时管控不可避免的竞争关系。^①

2014年7月,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在参加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时公开表示“我多次听到习近平主席提到新型大国关系。我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只靠语言来界定,而是应该由行动来界定。”^②其后,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比较谨慎,没有正面回应中国的建议。

美国专家学者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种态度:

一些学者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谨慎乐观。代表人物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John Hadley)。他认为有若干重要原因有助于美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其中包括:美中关系中没有某些导致大国对抗的传统因素,例如,美中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也不存在殖民野心之间的碰撞,美中也都不是19或20世纪的扩张主义大国;现在的主导大国,如美国不试图排斥、孤立或压制上升大国,如中国;在美中关系中有一些过去大国关系中较少的因素,美中两国是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亚首脑会议、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这些国际组织提供了解决外交、经济、贸易争议的手段,而不需要诉诸对抗或军队。美中两国开始看到合作应对一些跨国安全问题的好处。^③斯蒂芬·哈德利指出,美国许多人对过去70年的中美关系有误解,认为中美关系像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是对手,但实际上美中两国在未来的十年中有许多进行合作和避免冲突的理由。他提出,美中两国都面临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包括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需要进一步改革的受到削弱的全球金融系统,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对能源、食品和水资源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海盗、跨国犯罪等;美中两国任何一国都不能单独应对这些问题,这给了两国合作领导世界各国解决这些全球性挑战的动力,这也给了两国避免威胁这种合作的对抗的动力。他认为,美国应该接受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应该接受美国作为稳定因素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存在,双方都应承认中美“双赢”是符合各自利益的。^④

有美国学者研究了新型大国关系的特征。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

①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usan Rice Speaks at Georgetown,” November 20,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georgetown.edu/news/susan-rice-event.html>.

② John Kerry, U.S. Secretary of State, Press Availability, Beijing, China, July 10,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4/07/229019.htm>.

③ Stephen J. Hadley, “America, China and the ‘New Model of Great-power Relations’,” Speech at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13 November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america-china-and-new-model-great-power-relations>.

④ Stephen J. Hadley, “America, China and the ‘New Model of Great-power Relations’.”

关系研究院中国研究系主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会长兰普顿(David M. Lampton)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前提,是美中之间的重大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美中发生重大冲突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世界都是灾难性的,如果美中两国在关键的问题上不合作,所失去的机遇将是巨大的。他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特征是基于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包括扩大一国在另一国建立的能够增加就业的企业数量和范围;更好进行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国内协调;增强危机管理能力;拓宽、加深和机制化两军合作与战略对话;在亚洲建立包括中美的经济和安全机制,而不是一方建立排斥另一方的组织。^①

有美国专家研究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指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出发点。新型中美关系需化解信任赤字。他认为,自1500年起历史上大约出现过15次新兴大国挑战既有大国的情况,其中有11次都导致了破坏稳定的冲突。因此美中两国管理它们不可避免的分歧和竞争的必要性在增加;美中两国需要开始积极合作,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一同应对全球挑战;对于美中两国在一些历史性领域长期存在的分歧,两国领导人不应期待对方的态度会在一夜之间出现转变,如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为了打造可持续的新型大国关系,美中两国需要让本国民众信服这一关系符合两国利益。^②

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高级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M. Cronin)指出,大多数美国人虽然认知和一般来说欢迎中国的现代化,以及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但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合作应该建立在共同的规则 and 标准基础上。中国可以作为规则制定者,而不仅仅是遵守规则的,但中国必须以一种其他国家认可的方式行事,也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他建议,美中在安全议程方面采取三个步骤:美中需要谈判达成减少海上危险措施;美中需要阻止核扩散的威胁;美中官员应该在战略对话中寻求新方法来限制包括网络空间和太空中的战略竞争。^③

另有一些美国学者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持怀疑态度。《亚洲观察》杂志主编梅尔·格托夫(Mel Gurtov)认为,美国仍然担心中国是否能发挥稳定与和平的作用。他提出,美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存在五大障碍,包括:不同的认知、不同的观念、冷战遗产、两国间沟通问题、美中军事平衡等。美中两国对对方和自身有不同的构

① David M. Lampton,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Seeking 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S.-China Ties," *Asia Policy*, Number 16 (July 2013).

② 刘赫《新型中美关系需化解信任赤字:访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1期。

③ Patrick M. Cronin, "The Path to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Pacnet Newsletter*, in Pacific Forum CSIS, Nov. 7,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acnet-80-path-new-type-great-power-relations>.

想,中国一些人认为美国是中国崛起的主要障碍,而美国宣称它在国际上享有例外地位,作为自由世界的头领,美国有权利和责任谈论其他任何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务。虽然有些美国分析家认为中国正在军事能力方面赶上美国,但实际上在军事力量的每个方面,美国相对于中国占有很大优势,因此谈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还为时过早。^①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谨慎乐观派也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存在很多挑战。斯蒂芬·哈德利提出,美中两国政府获得国内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是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不努力做到这一点,美中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就会推动“零和”游戏在两国关系互动中占主导地位,这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通过合作寻求在解决全球问题中实现“双赢”是背道而驰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是美中两国军队发生对抗的潜在危险,这种对抗会导致两军的海上甚至更大范围的冲突,并损害两国的全面关系。^②

(三) 建立新式战略稳定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条件

新型大国关系应该建立在新式战略稳定的基础上。新式战略稳定不同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以“相互确保摧毁”为主要特征的战略稳定关系。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首先实现和维持战略稳定,因为新型大国关系只有建立在战略稳定上才能有坚实的基础,才能相互尊重,并寻求互利共赢。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必须是新式的,其中主要特点包括:

其一,良性互动型稳定。中美战略稳定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中美分别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上升大国和守成大国,它们的实力对比是在变化中的。两国必须实现动态稳定。这种动态稳定又必须是建立在良性互动基础上的。在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是建立在恶性互动基础上的,即美苏核军备竞赛“水涨船高”形成“相互确保摧毁”的态势。中美关系决不能走这条老路,决不能陷入“安全困境”搞军备竞赛。中美都是核武器国家,双方发生战争不符合任何国家利益。而且,虽然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仍很重要,但在中美关系中的影响有所下降。中美在安全方面必须实现良性互动,即双方都不把对方视为敌人,都全力避免两国关系走向对抗,都做出持续努力在安全领域向对方发出善意信号和给以善意反应。

其二,综合性稳定。中美战略稳定不是单项的,而必须是综合性的。在冷战时期,美苏战略稳定主要是通过双方战略核武器的“恐怖平衡”来实现的。而在中美关系中,核武器只是一个边缘性的因素。在构建中美战略稳定关系中,核武器也只是其

① Mel Gurtov,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 'New Type' of US-China Relationship,"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Volume 11, Issue 52, Number 1, December 27, 2013, available at: <http://apjif.org/2013/11/52/Mel-Gurtov/4052/article.html>.

② Stephen J. Hadley, "America, China and the 'New Model of Great-power Relations'."

中重要因素之一,而不是全部。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有很大发展,这对两国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尽管两国在经贸关系中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但双方谁也离不开谁,都在努力寻求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和矛盾。中国不希望美国经济陷入危机不能自拔,美国也不愿中国经济停滞不前。如果中美断绝经济往来,双方都会遭受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尽管相比较而言,美国的损失会比中国稍小一些。中国购买了美国 1.3 万亿美元国债,这成为一种相互威慑,如果中美陷入冲突或对抗,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美国经济会遭受重大损失;美国也可采取其他方法使中国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其他影响中美战略稳定的因素还包括:导弹防御体系、网络武器、太空武器、全球快速常规打击武器等。

其三,非对称性稳定。中美战略稳定又是非对称性的,因为两国的实力对比是不对称的。在核武器领域,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核武库,并未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中国的核武器数量少,但也具有一定的核报复能力。这种在核武器方面的战略稳定是不对称的,但如果美国不试图用首先使用核武器、加强导弹防御体系或部署全球快速常规打击武器等来冲击这种非对称性的平衡,这种战略稳定是可以保持的。

在经济领域中,中美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关系是脆弱性与韧性并存。中美两国意识形态不同、经济利益差别、政治制度各异,要在它们之间建立强有力关系非常困难。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曲曲折折、起起伏伏,但仍在向前发展,表明了两国关系又是一种具有韧性的关系。这种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关系又具有两重性。主要表现在中美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既对话又斗争,斗而不破,合而不同。这是由于两国之间既存在广泛和重大的共同利益,又有着许多不同和各自的战略需求和安全、经济利益。从大趋势上看,中美在经济方面的战略稳定将逐渐朝对称性方向发展。

中国和美国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抛弃你输我赢、迷信武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冷战思维,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美关系,认识到“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接受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

(四) 中美战略文化的博弈和磨合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路径

中美战略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战略文化的差异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障碍。要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通过博弈和磨合,来实现中美战略文化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相互适应。

战略文化是有层次的。中美战略文化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政治哲学层次、国家战略层次、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层次。

1. 政治哲学层次的中美战略文化比较

美国战略文化在政治哲学上主要是天定命运观(Manifest Destiny)。清教徒约

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为了逃避宗教迫害在1630年离开古英格兰登上开往美洲新英格兰的“阿贝拉”号船。他在船上布道时称,上帝想把美洲塑造成“全人类”的典范,“我们应该成为山巅之城。全人类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①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认为,美国不只是正在形成的大国,也是一个“自由帝国”,是一股代表全人类捍卫善政原则的不断扩展的力量。他在担任总统时写道“我们感觉肩负的责任不限于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时势拒绝了别人,但对我们偏爱有加,赋予我们责任,去证明一个社会可以去为其个人成员创造多大的自由和自治的空间。”^②

虽然美国战略文化在政治哲学层面显示出很强的道义色彩,但在实际制定和推行政策时美国却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指出的“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然而历史上,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它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实行强权政治。”^③

中国战略文化在政治哲学上主要是和谐万邦观和天下大同观。中国人早就强调追求“天地人和”,即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提出“协和万邦”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友善思维,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想,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即以互爱互利的原则来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实现天下大同。在当代,中国提出“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中美在政治哲学上都具有很大的理想主义,都希望能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这是两国政治哲学的近似之处。美国政治哲学主要强调个人成员的自由和自治,而中国政治哲学主要强调天下为公和天下大同。但美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利用一些为了世界和人类自由的说法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因此,美国在其所宣称的目的与其实际的作为之间存在巨大矛盾。而中国主张将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相结合。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战略文化在政治哲学上的理念有时给人以与中国外交战略和军事

① John Winthrop,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in Hacht, Anne, ed., *Literary Themes for Students: The American Dream* (Detroit: Gale, 2007), pp.359~370.

② Paul Leicester Ford 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892~1899, pp.158~159, in Robert W. Tucker and David C. Hendrickson, *Empire of Liberty: The Statecraft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1.

③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481页。

战略脱节的感觉。例如,中国政治哲学主张天下大同,但中国在制定和推行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时也必须根据国家利益,这会给一些其他人觉得中国的宣传与实际不一致。

2. 国家战略层次的中美战略文化比较

美国在独立初期实行“孤立主义”,不与任何国家(主要为欧洲列强)结盟,不卷入欧洲列强纷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治理本国事务。1823年后实行“门罗主义”,将美洲作为其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在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冷战结束后,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经过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消耗,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兴起,美国的国力相对下降。

美国再次面临着一个选择,即它是否会走进一个“战争——均势——同盟——战争”的怪圈。欧洲“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后,均势开始体现为一种体系。换言之,实现这种均势已被公认为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之一。一旦均势被破坏,就会出现一个维护均势的同盟。”^①欧美国家在传统上认为安全意味着均势和对权力运用的限制,其结果往往是在均势体系下寻求结盟导致战争;战争之后形成新的均势,均势体系下寻求结盟再导致战争。

美苏冷战时期,两大军事同盟在均势体系下相互对抗,虽然没有导致战争,但主要是由于美苏战略核武器的“恐怖平衡”使双方都尽力避免战争。

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体系有两面性。以美日同盟为例,既有防止日本重新走侵略扩张道路的一面,也有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性。在中日关于钓鱼岛的领土争端中,既有替日本撑腰的作用,也有制约日本武装挑衅的因素。

2011年11月,奥巴马政府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亚太地区强化与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韩国等的军事同盟,加强与越南等国的军事合作。美国和日本甚至试图构建“美日印澳菱形”安全合作机制。这些加剧了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增加了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中国自宋代以来,国家战略是以防御为主。中国古代历史上在中央政权强盛时,在东亚地区会形成“朝贡”国际体系。它的主要特点包括:中国主导下的和平;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主义”;以“礼”为核心调节和约束国家之间关系;以“朝贡”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贸易等。但中国儒家治国模式加上中国土地的广大和人口的众多,往往形成“超稳定”的统治架构,其内部的逐渐腐败会导致农民起义和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最终是旧王朝的覆灭和新王朝的出现。而每一次动乱都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并使广大人民群众遭受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与此相对应,这导致东亚“朝贡”

^①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28页。

体系形成“无序——建立——稳定——再无序”的怪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在国家关系中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域外力量在东亚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东亚“朝贡”体系不可能再出现。

在国家战略层次,中美之间有结构性矛盾,美国是国际体系中主导地位的大国,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上升大国;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中国还在朝着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因此中美之间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中美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当前美国维护以其为领导的国际体系。这个国际体系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美国价值观;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体系;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是《联合国宪章》最早的签署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标志着中国接受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现在中国主张维护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包括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产生的国际秩序。这方面中美是有共同利益或相似利益的。同时,中国主张改革现存国际秩序中不公正和不合理的东西,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双方在同一个国际体系中,中国长期战略目标是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现代化,并不想挑战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中美都反对任何国家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中国对现有国际体系做出的改革和补充,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有助于现有国际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这与美国利益并不是对抗的,两国可以进行磨合。

美国和中国都应该尽力避免历史上的怪圈重演。中美战略文化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相互适应将有助于两国和世界避免这两个怪圈。

中国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中的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也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与美国价值观在一些方面是共同的或相似的。但中国反对美国利用人权干涉中国及其他国家内政。

中国和美国都重视国家利益,现在中美共同利益和并行不悖利益的上升使两国合作增加,既竞争又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常态。而且,只要双方共同努力,两国之间的竞争可以是相互促进的良性竞争。

3. 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层次的中美战略文化比较

美国战略文化在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层次是相当实用主义的。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阐述了美国的矛盾心态“美国人是讲道义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反映举

国拥护的价值观;但是美国人也是务实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收到成效。”^①

中国战略文化在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层次也是相当实用主义的。但中美战略文化在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层次有一些重要的不同:

——从思考方式和行事方式来说,美国人是自下而上,而中国人是自上而下。

——从应对事态来说,美国企图速战速决,而中国往往从长远历史观出发。

——从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说,美国迷信武力,认为施加重大压力,就能迫使对方屈服;中国慎用武力,认为应当用综合性和治本的方法来解决。

——从相互认知来说,美国人因为处于相对衰落中往往对中国过于疑虑重重,在讨论制订美对华政策时表现出不确定感、不安全感和恐惧等;中国人则因为处于崛起中而可能过于自信,但也可能走到另一个极端。

——从对领导的理解来说,美国个人往往将领导看作榜样和提供公共产品,但国家在实力有巨大优势时,会将领导理解为霸权;中国人更多将领导看作权力、指挥和领导能力。

——从对国际法的态度来说,美国有时采取选择性多边主义政策,有利于自己的遵守,不利于自己的就不遵守;中国在学习做负责任大国过程中,遵守国际法,但运用国际法维护本国利益的知识观念和观念有时不足。

——从对盟国的态度来说,美国有庞大的军事盟国体系,并对盟国做出了各种承诺,存在美国被盟国拉下水,卷入一场与他国战争的危险;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从对国际透明度的态度来说,美国既把透明度作为国际机制和国际法的要求,又作为美国威慑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战略文化是不讲透明度的,现在已经接受了透明度概念,并逐步在实际方面取得进展,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做的不够,有时不能利用增加透明度来维护本国利益。

——从处理连续性和变革的关系来说,中国的战略文化强调连续性,而美国每一届新政府上台都要强调变化。但实际上,中国是在强调连续性的框架下进行适应现实需要的变革;而美国每一届政府在政策变化的说辞下都不得不保持战略的某种连贯性。

中美战略文化在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层次的这些不同,表明即使两国共同处于全球体系中,但双方的文化和观念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博弈和磨合,才能够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相互适应。在这一过程中,中美都必须做出重大努

^① George Shultz, "Power and Diplomacy in the 1980s,"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84, No. 2086, May 1984, p. 13.

力来防止两国因这些不同而导致对抗和冲突。

结 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将全球共生系统理论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依据。中美都视自己为新型大国,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新型的。基辛格将中美关系理解为是“共同演进”(Co-evolution)的关系,不是伙伴关系,也不是敌对关系。^①“共同演进”的概念超出之前一般国际政治法则的视野,而带有中国政治文化的意味。中美“共同演进”就是两国长期持续的共生共处和相互重塑,实际上也体现了全球共生系统理论。

主导地位大国与上升大国之间不可避免有着权力转移。在历史上,通常国际体系中主导地位大国与上升大国之间存在对抗关系。但现在时代不同了,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有着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的客观可能性。中美经济上相互依存,安全上也有许多共同或近似的利益,发生战争将使两国付出比收益大得多的重大损失。双方都应为防止对抗和冲突做出最大努力。在当今时代,权力扩散,如“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等,对中美两国和全球体系的威胁更大。因此更重要的实现中美权力共享,即中美两国形成大国协调,通过相互协商和相互协调,共同应对面临的挑战和实现共同的利益,实现合作共赢,构建全球共生体系以代替霸权型国际体系。

夏立平: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 魏红霞)

^①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第56页。

THE CHI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February 15 , 2017

Vol. 31 , No. 1

Special Contribution

Analysis of the U.S. Asia-Pacific Economic

Strategy *Zhang Yunling* (9)

The U.S. has put great emphasis o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 and has succeeded in building close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area. It has expanded its economic space in the region by adopting a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n the three regions—the Asia-Pacific , North-South Americas and East Asia. President Trump formulates the " American First" foreign policy by renegotiating NAFTA , withdrawing from TPP , promoting bilateral negotiations and forcing companies to manufacture in America etc.. These measures , however , would undermine the past achievements and not be helpful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the country.

FOCAL TOPIC:

Research on Xi Jinping' s Thinking about Foreign Affairs: Building 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Symbiosis System Theory and Construction of 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Xia Liping* (21)

All things in the global system are interrelated , interacted , interplayed , and mutually transformational. The interdependence theory of global symbiosis system theory indicates the necessity to optimize this global system.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on the rise in the global system , which i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For constructing this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 , to establish a new kind of stable strategic relationship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it. The way of gaming and adjusting between these two strategic cultures is the critical path to it.